

《共和国农业要事研究》阶段性研究报告

未经许可
请勿引用

共和国农业史料征集与研究报告

第十集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多年来，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了真实地、完整地记录共和国农业发展的光辉历程，我室正组织开展“共和国农业要事研究”。为了推动该项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我们将陆续编印阶段性编研成果《共和国农业史料征集与研究报告》，广泛征集共和国农业史料，并通过这一方式广泛征求对史实的真实性、完整性的审核修改意见，以留下科学的信史。

现将陆续编印的《共和国农业史料征集与研究报告》送上，敬请有关部门、当事人、知情人审核和补充修改，提供重大农业历史事件的知情人、当事人等线索，撰写反映重大农业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纪事本末体文章或亲历的重大农业历史事件的回忆文章，把历史留给后人！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在撰写、核校共和国农业史料方面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载史册，后人定会感谢您！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目 录

农村改革座谈会谈话记录.....	(1)
------------------	-----

• 经济管理 •

建国 53 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	刘国光 (27)
----------------------------	----------

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	武 力 (34)
---------------------	----------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特点.....	董志凯 (45)
------------------------	----------

• 历史回朔 •

一起没有公开报道的大事件

——1975 年淮河大水灾的回顾与思考.....	张广友 (60)
--------------------------	----------

50 年代经历的几件事情.....	黄佩民 (80)
-------------------	----------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纪实.....	许人俊 (87)
-------------------	----------

山西省晋中地区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温晋生 (100)
----------------------	-----------

• 技术变迁 •

“文革”期间的农作物遗传育种工作.....	黄佩民 (118)
-----------------------	-----------

农作物增产技术变迁概览.....	信乃詮 (129)
------------------	-----------

浙江水稻品种 50 年回顾.....	徐旭增 詹黎耕 (139)
--------------------	---------------

青海钾肥 1993—1996 年试验示范回眸.....	唐近春 (147)
-----------------------------	-----------

• 国际合作 •

建国后到“文革”期间我国对外科技合作协议中农业项目概况

.....	朱丕荣 (156)
-------	-----------

近年来农业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的一些情况.....	朱丕荣 (161)
--------------------------	-----------

• 研究综述 •

2002 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	(165)
------------------------	-------

农村改革座谈会谈话记录^{*}

高文斌：今天我们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今天是7月18日，正逢杜老90岁的生日，我提议大家用热烈的掌声祝杜老生日快乐。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来自各单位的领导、农村问题的专家、企业家和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安排半天，会议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然后与杜老共进晚餐。

这次农村改革座谈会由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具体操办，会议得到了很多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代表主办单位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们今天开会的这个地方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京城有名的京西宾馆，很多同志到这里会触景生情引起很多回忆。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杜老曾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就是在这座宾馆里，多次主持召开指导农村改革的重要会议，代党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指导农村改革的重要文件，包括人们常说的“5个1号文件”。在座的很多同志都亲自参加了会议，参与了文件的讨论和拟定。

今天在杜老90高寿的时候，大家看到老人家依然神采奕奕地和大家坐在一起，回顾、座谈中国农村改革，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且也是非常值得高兴和庆贺的事情。让我们大家一起祝杜老健康长寿。

在请大家发言以前，我要发布一个信息。大家知道杜老把自己的一生致力于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事业，从土改、合作化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改革，一直到现在，虽然已年高90，早就不在其位，但老人家心系农民，关注农村改革，研究“三农”问题从来没有间歇。前两年，他提出来要设立一个农村发展研究基金，希望通过奖励在农村问题研究中，包括政策咨询、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等方面，取得成果、做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特别是中青年研究人员，用以鼓励和推动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促进农村改革。杜老的这一想法得到很多同志的赞同、支持和帮助，包括现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同志，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先后两位领导段应碧同志和陈锡文同志，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农经司的司长杜鹰同志，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柄生同志，还有企业界的翁永曦、王乐天、吉小安等同志。有的同志为建立这个基金，进行指导、策划、筹备。王岐山同志还是在国务院体改办任主任的时候，就商定由他出任这个基金的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后来因为他工作有变动，我们确定这个基金的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是陈锡文同志。还有的同志已经捐资赞助这个资金，有很多同志一直热心关注这个基金的建立，表示要积极支持这项事业。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民政部已于7

^{*} 2003年7月18日，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举办了“农村改革座谈会”。这里摘录了11位同志的发言。这些发言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未经本人审阅。

月4号正式批准注册设立这个基金，至此杜老想设立一个研究基金的心愿实现了。

下面大家开始发言，我们事先安排了几个同志专题发言，如果还有时间，大家再自由发言。首先由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堪同志发言，刘主任在位的时候，每次开农村工作会，分工都是管文件组，负责文件起草工作。

刘堪：分配我在这个会上发个言，我很轻松地答应了，但坐在这里感到分量很重。今天的会叫农村改革座谈会，又逢杜老的90大寿，要两个主题兼顾。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90寿叫做耄寿，就是一个老加一个毛的那个耄字。我们一般说耄耋之年，80叫耄，90叫耋，八九十岁的人就可以称耄耋之年了。我今年77岁，只能称老，或者叫近耋之年。一百岁叫颐寿。我想再有10年，就是杜老颐年之寿了，到那个时候，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到会，向杜老祝寿。

我和杜老相处24年，前半段主要是工作联系，后半段主要是思想交流。我是杜老的属下、助手和学生，还是朋友。会议给我出的题目是讲5个“1号文件”，这一段时间包含着杜老在农村改革里面的重大功绩。在这个会上，只能简单地讲一点我的认识。

农村改革的头10年是在杜老的一生中光辉的10年，与他10年之前和10年之后的境遇比，象是打了个时间差。1989年秋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同志对我说过，杜老的一生是不顺的。怎么不顺，他没有细讲。按我的理解，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杜老处境是不顺的，正对他实施几个不准：不准发表文章，不准离开北京，不准出席会议（当然批判会不算）。再向前面看，杜老最大的不顺可能就是建国后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那一段，被叫做“小脚女人”，代表富裕中农利益，被批判后调离了农口。但是我说杜老最光辉的10年是从1979年到1989年这10年，并非说其余时间是不光辉的，依我看在另外两个不顺的年代，也同样是光辉的，同样是值得纪念的。

杜老在10年农村改革时期，身处中央农口的领导岗位，主要作了两件事。一件叫做说服、鼓吹，作了大量推动改革的思想工作。第二件是纵横折衝，要联系上下内外，淡化矛盾，保证改革顺利、平滑地进行。我想过来的人都知道，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当时推动农村改革的关键，恰好又是杜老的长处。

我是这样认识的，中国农村改革直接触及产权结构，涉及人的基本权利。它的动力来自农民。这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吃饱肚子的动力；农民要吃饭，问题非常简单。阻力主要不在什么目标设计、制度创新，甚至也不直接关系社会利益的调节。它和城市改革不一样，只要尊重农民的选择，肯定农民的经验就够了。而当时阻力主要在意识形态，来自人们的思想。因此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服，说服上面，说服各级干部，说服各部门和各界，甚至还要说服有的农民，因为包产到户是一种罪行已成为历史冤案了。据我所知，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句话的就是一位农民劳模，反映了少数农民思想不通。大家知道，杜老最擅长的工作就是说服人，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讲话，利用各种机会，走遍大江南北，鼓吹大包干的好处，为农民的要求和经验辩护。当时中央历次的农村文件同样也是一步一步地肯定农民选择的。

有几次农村工作会议，杜老的讲话都是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的。他说了很多开脑筋的话，可以列举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强调要尊重农民的选择，这是反复不断讲的。大家知道，这可以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套话，但这次改革不是，确实是尊重农民的意愿、摆正同农民的关系了。第二是反复说明中国农村情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一点是较易为人所接受的。1980年的那次各省（市）委书记座谈会，起草文件的时候很困难，因为意见尖锐对立。这就是吴象写阳关道和独木桥文章的那一次。我记得杜老后来说，那个文件万里同志评价最好的是讲多样性的那一段。他说这一段是马列主义的。至于那个文件的其它部分他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例如文件特意加了集体经济是农业的方向的一段话，没有这段话，那个文件就难通过。第三是决策可以不一致，允许分地区决策；多样性为分区决策提供了前提。有了分区决策，就能产生新的事物，就会互相影响、互相观摩、互相促进。第四是杜老反复讲农业生产的特点最适合家庭劳动，这是因为农业生产要求灵活地适应和利用自然条件，分工又不像工业生产那样严格，家庭劳动最容易与土地等自然因素相亲和。总之杜老作了大量的有创造性的宣传说服工作，我现在还说不全，只提出这几点。好在杜老的著作在，大家可以研究。

我说的纵横折衝，就是要照顾到上下左右前后，看不同情况、不同认识，取长补短，尽量兼顾，以利于政策出台。这也包含中央文件或杜老的一些语言在内。那时候必须要照顾到几十年培养的集体经济模式的观念，初期改革要和这个挂钩，不能离历史太远。包括什么“联产承包责任制”，什么“双层经营”，说老实话，既不联产，也没有什么责任制，双层经营也很费解，但那时候必须这么说、这么写。那时就有人提出来这叫什么责任制啊？确实按传统观念理解责任制是集体经济内部的劳动管理制度，大包干以后，劳动谁管谁啊？还有联产，其实早不联产了。后来中央把这个词稍微改了一点，但责任制还在。这就说明，新制度是从旧制度逐步演进而来的，它带有旧制度的痕迹。我们不但要承认这一点，而且也利用这一点，事情才能顺利前进。

我们参加起草的几个文件，经过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的只有两个，一个是1983年的，一个是1987年的，其它几个文件都是由书记处讨论，请政治局的老领导传阅，画个圈就行了。那时候书记处是耀邦、紫阳、万里等人起重要作用，每次文件他们同意就差不多了，这是改革初期的有利条件。如果领导不是这个格局，那就可能完全不同。我记得1980年农委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大一点的会叫经营管理会，那次会就不成功，中央一个字的文件也没拿出去。因为什么呢？当时农委的领导、国务院的领导，都不赞成包产到户。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央汇报，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小平同志都听了，最后小平讲了三步走的目标，根本对农村经营管理（实际是包产问题）没有表态。

1983年的那个文件，实质问题比较多，包括雇工问题，包括农民自买汽车、拖拉机的问题（汽车、拖拉机是大型生产资料，个人是不允许买的），还包括农民能不能长途贩运的问题，再加一个允许不允许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问题（指非农业），这四大问题当时非常敏感。杜老采取的办法是先召开座谈会。记得开的是二三十人的座谈会，都是中央

各有关部门和几个省的有关负责人，地点在西苑宾馆，时间是1982年秋。我住在那管这个事，杜老经常去。会上分歧很大。座谈完了以后，把倾向性的意见写成文件，由农研室上报，先请中央批准了以后，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那是非常小心的。这个文件解决的问题，除了农产品统购、派购外，实际上把农村的基本问题都包括了，当然还不能说解决的很彻底。

到了1987年，再搞文件就比较吃力了。1986年冬，就在京西宾馆的这个楼，我和杜老在东头的套间里议论。我们感到象1号文件这种形式的文件应该结束了，不能再发了。因为政策语言、号召性的东西，已经不起作用了，而今后需要的是专业的、操作性的、甚至是需要专门的法律法令了。那时经过几年的改革，农村经济新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记得那时京西宾馆的新楼正在施工，搭着脚手架，我们还指着那边说，这不是框架吗？农村新的经济体制虽然还没有完善，也不能说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运行机制，但已经有了新的框架。我记得这个文件写了几行告别的话，一段总结性的语言，标志一个阶段。果然，到1988年的农村工作文件，就改为由国务院只就几个实质问题发文下去就行了。

杜老在农村改革初期这10年的工作，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特别是农民不会忘记，很多农民都知道有个杜润生，在农村改革中为他们说过话。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个躺椅，很多同志都看过，躺椅表面上镶着的不知是玉石啊还是什么石头。那是一位杜老不认识的农民送给他的，代表着农民的心愿。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进博物馆，很值得留作纪念。

除了我说的这些以外，根据我和杜老的相处，他有几点特别突出的品德。除了思想理论水平，对农民的高度关心，对农民的利益高度关注等等这些方面以外，我还想特别讲两点。第一，他的思路是十分开阔的、思想是十分活跃的。他善于在众人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思维，提出新的创见。尽管现在杜老已90高龄，还不仅是思维清晰不清晰的问题，而是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求新。人的一生中不停步、不落后，这是非常难得的。第二，杜老有兼容并蓄的宽厚风格。在农研室这个小单位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向他交谈任何问题，谁都可以站起来和他争论，包括很年轻的同志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和他吵，吵得面红耳赤。杜老、杜老，我也是在他离开了工作岗位以后，才叫他杜老，原来我们都叫他老杜，甚至比我年轻的也都叫他老杜。在工作中他对不同意见，是持欢迎态度的，而且是尽可能去搜寻不同意见的。当然他也不是谁的意见都同意，他有自己的选择。小小农研室能有那么一个活跃的局面，能够开拓一个广阔的工作空间，能够出一批人才，这都是和杜老的领导和作风分不开的。

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杜老并没有休息，除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就是整理他的讲稿、文稿。我每次到他那里去，一推门总是看到他在埋头工作；90高龄，比我勤奋多了。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这几年他的精力、他的思想，很大一部分转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十六大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寄予希望。他认为当前政治体制改

革滞后是社会弊端的根源，但如何改革，我想他正处在一个痛苦的思索过程。杜老 90 高龄，从政的历史已有 70 年，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经过地下工作的考验，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土改和合作化中担负过重要的工作，后来又成为农村改革的中坚，还有科学院工作的那一段，70 年不坠青云之志。一个人的人生是有限的，能够经历这么多的事情，就是一本记录沧桑的书，的确是我们的财富。现在杜老虽然是 90 岁了，但霞光正满天，大可不必有夕阳之感。我希望有机会继续向杜老学习。我就讲这么多，谢谢了。

陈锡文：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研讨会，因为恰逢杜老 90 岁生日，衷心祝愿杜老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我是一个晚辈，想起来是在 24 年前第一次见到杜老，当时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是个学生，那时正是中国农村改革风起云涌的时候。我记得最开始我们这些学生到农村进行双包到户的调查，就由杜老直接领导，回来也是向杜老直接汇报。从那以后 20 多年，作为一个晚辈，有幸在杜老直接领导下，工作、学习 20 多年，对我来说是一大幸事。现在已经过去了 20 多年，杜老 90 高龄了，仍然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活跃和敏捷，我们也为此感到由衷地高兴。

前几天高文斌同志跟我说，庆祝杜老生日之前，有个研讨会，而且一定说要我讲一讲，其实按刚才刘主任说的，您说您当时很轻松地答应，而我当时就不大敢答应。因为我觉得参加这个会的同志，有很多是我当年（20 多年前）的老领导，那一段的经历应该说他们比我清楚的多，很多文件，他们都是直接参与讨论，甚至是制定，我们在那个时候还是 30 刚出头，都还是毛头毛脑的青年。作为晚辈，在座的像我这么个年龄段的同事们也不少，基本上我们的成熟、成长都是从接触双包到户开始的。我们每次有机会与不搞农村工作的同志谈话，我总是跟他们讲要理解中国农村的改革，光说包产到户是不够的。因为很多人（城里人）讲包产到户讲得多，而讲包干到户讲的少。但我想，真正对中国农村及对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起了巨大作用的，就是包产到户向包干到户这个重要的转折。我结合这个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我记得最开始人们讨论的还不是一个包产到户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基本核算单位不能划小，一开头还是那个问题，后来逐渐逐渐地包产到户开始普及。但是在后来我翻阅以前的那些调查笔记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什么呢？当人们开始大规模地讨论包产到户的时候，实际上农村基本已经不是包产到户，而基本都是包干到户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大家都知道，所谓包产到户是农户承包的是土地上的产量，他要按照承包合同上缴产量后，再从生产队分得口粮，分得工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如果只有包产到户的话，那么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核算体系还会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只要有包产到户，那么人民公社的体制就还会存在。问题是农民悄悄的就转向了包干到户。

我记得农业经济理论界也有一些讨论，比如说包产到户谁最早，学术界一直有个说

法，最早包产到户的是安徽肥西县，凤阳县其实比肥西晚。但是后来为什么人们都讲凤阳县，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凤阳的小岗是包干到户的发源地。包干到户就是农民的那句话，“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简单，似乎是个分配方式问题，但从它的实质内容上看，我觉得意义很深，最重要的就是它使得农民的家庭真正地成为了一个核算主体。正由于农民家庭成为核算主体，所以生产队这个核算主体瓦解或者说是废除，是非常自然的、水到渠成的一件事。

我觉得就像刘主任讲到的，杜老指导农村的改革是有着非常高超的艺术。农村改革最开始的这关，比如说从包产到户角度去讲，讲联产承包，讲它和农业生产特点的联系，讲它仅仅是一种分配方式，是分配形式的变化，或是内部管理的变化，一开头讲农村改革，都是这么讲。但是回过头来一看非常清楚，自从有了包干到户，实际上农村的改革，就从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从分配方式改革，逐步地转向了农村财产关系的变革。由于农民开始有了“留下都是自己的”那一部分，而只要他付出足够的劳动，留下的也就足够多，多到他自己消费不完，多到他可以去市场上卖，换成货币，最终又把货币变成资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农民的家庭才从包干到户的基础上，逐步逐步地长出了属于自己的财产。我们现在从统计上就可以看到，整个农村现在将近有 1 个亿属于农民家庭所有的财产，而这块财产就是在包干到户的基础上长出来的。从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的转变，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奠定了让人民公社消亡的基础，而且朝着向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在财产方面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所以我在和城里同志讨论的时候，他们开口闭口还是讲农村改革就是包产到户，那我总要和他们解释农村真正变化的不在于包产到户，而在于包干到户。而包干到户这个东西对于城里人来说，也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其中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城市改革十多年了，一讲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讲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总是讲如何找到公有制经济的实现方式、实现形式，如何寻求这样一种有效的实现形式，好像寻了半天，还是没有寻的太清楚。但是对农民来说，在包干到户这个问题上，关于公有制的财产的实现形式问题，已经找到了一种非常好的路，比如说包干到户。包干到户到现在已经 20 多年了，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说土地集体所有变成私有，但是你看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农民家庭经营的集体土地上长出了属于农民家庭自有的财产，而且这种自有的财产不是靠把集体的土地卖掉，把集体的家当装到自己口袋里实现的（从统计资料上很清楚看到，农村集体的资产也是在不断地增加），而是找到了这样一种集体公有资产的有效实现形式之后，才使得农民家庭的财产和农村集体的财产都在增长，实现了这样一种双赢的局面。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应该还有很多深刻的内容，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索。

我今天谈这个过程，在座的老领导、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都是非常理解、非常清楚的。我之所以要讲这个，是因为刘主任讲到杜老这几年最关注政治体制改革，也包括农村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也在经常琢磨，为什么 80 岁以后，杜老开始更加关注农村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在探索，在想这个问题，不一定对，也不见得杜老就是这

么想的。人家都知道双层经营是杜老最先提出来的，规范的提法大概是1983年。我记得有一次是1982年年底，在大雅宝空军招待所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是制定1983年的1号文件那次。有一次在吃午饭前，我在杜老的房间里，跟杜老汇报我们下去调查的情况。到吃饭的时间了，跟杜老出房间一起出来乘电梯下楼。在电梯里我和杜老讲，你说的这个双层经营，我不是很赞成，我说农民这层是经营，村里这层好像不是经营。结果杜老当时跟我说了一句，回想起来到现在21年了，在电梯间里说的一段话，依然在耳边回响。杜老说，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深刻。那么我理解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在一种似乎没有发生很大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就把农村的财产关系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方向捋顺了，过去了。因为没有个人的财产，最终不可能有市场经济，而要有个人的财产，别人都认为是要分集体的家当，农村的改革却不是，是通过一种保存集体财产的存量，合理分配包干到户之后的增量，来解决个人的财产积累的方法，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我想当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干到户的结果会长出一大块个人财产的话，这是在当初就搞不下去的。所以我觉得杜老当初提出双层经营，确实有着非常深刻、非常强烈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这才得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将农村改革顺利推进。但是我一直这么想，农村可能有很多后遗症，就是人民公社的阴魂在有的地方还不散，这种东西我坦率地说句话，可能和双层经营的提法也是有联系的。

农民经常地评价决策措施，1985年以前，那个时候农民觉得改革的初期心情非常舒畅，干群关系也比较融洽。我们经历过这一段的人都会感到，当时如果下乡调查的话，农民听说你是从北京来的，从省里来的，他非常热情，什么话都愿意说，愿意跟你讲，拉你在家吃饭等等，一个劲地夸改革好。从80年代中期以后，应该说很多方面起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农村基层的干群关系，农民对于所谓当官的这种看法，对于我们的有些体制和有些做法，负面反映逐渐多起来了。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微观的经营体制改革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是整个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在相当大程度上至今仍然是延续着人民公社的那一套，乡村组织基本上还是这么一个格局。而且不论是谁当了乡镇长，还是当了村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或者是村民小组的组长，他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行为方式，大概和过去人民公社的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可能还是差不多的，他总觉得他有权管农民，我有权让农民这样做那样做，甚至我有权剥夺走法律赋予农民的这样那样的权力。那么这件事我细想起来，我那会儿也是根本不认识这些，但是我想杜老在晚年特别注重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农村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在想是不是和杜老在80年代初提出一个双层体制，要在农户的上面加一层管理者有关。现在的这些管理者，它还不是提供社会公共品的管理者和服务者，是可以直接干预农民生产生活的那样一种管理者，在当时我觉得为推进改革，这是迫不得已的，但是这个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话，那么十六大提出的真正要让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这个主体的地位是确立不了的。而如果在我们的微观经济层次中，农户都不能确立他的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那么可想而知，其他的

企业，其他的方面就都是一样，这必定会给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带来困难。

所以我自己也在琢磨，应该说从 90 年代以来，我们到农村去调查，大家都感到困难比以前大的多得多。不仅仅是说到了县里，到了乡里，到了村里，各级干部似乎都不希望你去看农民，即使见到，也会坐到你边上，生怕你知道更多的真实情况。干部是这样一种心态，就是农民都不大愿意理睬你，觉得你来半天，你能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最后人家明白我毕竟还是在支部书记，还在乡党委书记领导之下，你能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杜老从开始关注农村的经营管理体制、农村的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到最后农村的财产关系问题，当然现在更多地关注农村的政治体制，我觉得这里有必然性。实际上我觉得农村的改革还远没有完，不要说是经济体制方面，政治体制方面的当然是更还没有破题，从我们现在的实际状况看，应该说至今为止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完全、覆盖面最广的农村基层组织，就是社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叫村委会。至少在形式上它把所有农业户口的人都编入在某一个组织之中，没有人可以漏在外边。但是你去农村去调查，真正能使农民对这一组织感到满意的数量是不多的。咱们老仇（指北京市窦店村）那儿是另外一种类型。大多数的农民都觉得要这样的村组织在那儿干什么？除了跟我收钱，能帮我干什么？都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从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我有一个感觉，我们现在的农民并不是说不要组织，他非常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势单力薄，一个人无论是跟市场，还是跟其他的主体去谈判的时候，他总是处在一个不利的地位。他要组织，但问题是现在的这种组织，我的讲法就是由于它是人民公社的延续，所以我把现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叫做一种内向性的、封闭性的、政府行政职能延续性的管理型的这样一种组织。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民更需要的是一种外向型的、经营性的、能够帮助农民降低市场风险的这样一种组织。而这种组织应该说还非常薄弱，大多数地区还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杜老一生致力于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一直到了 90 岁的高龄还在向我们提出新的课题，就是说要想真正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仅仅研究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不够的，一定要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能够相协调。所以我觉得要讲双包到户，比如有多少经验可以总结，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可以说几大篇，我就觉得这 20 多年来，在杜老的领导下，尤其在和杜老的接触中，我自己从中受到了很多深刻的教益，你比如我自己，也是 50 过了的人，经常回想过去，那么一想，我就觉得 1982 年底在大雅宝空军招待所的电梯间里，杜老跟我讲的这句话，当时不提双层经营就要掉脑袋的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

后来的一次，我就记得 1993 年年初，陪杜老在上海考察，杜老还说过一句话，我也印象深刻。有几个在座的同志跟我一起去的，在上海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村里面，市里农委的同志，还有当地的同志，都在跟杜老介绍，这个村的资产有多少，经济结构是怎们样的，收入分配水平达到了什么，讲了很多，但是说到最后一点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实际上都在这一个集体组织里头，共同的生产、共同的生活。当时杜老讲了一句话我也觉得给我触动非常大。杜老当着这些上海同志说，大树下面无杂草，

生态不平衡。这句话给我印象也非常深。所以刘主任刚才讲到杜老一生主张多样性，我觉得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一个模式是搞不成的，杜老说的这句话，人树下面无杂草，生态不平衡，很值得我们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去认真的思考。

20 多年的时间，在杜老的领导下，我觉得确实杜老作为老一代、作为老领导，给我们年轻一点的同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刚才刘主任讲了几点，我都非常赞成。我自己也有这么三点非常深刻的体会，第一，杜老在当中央农研室主任和国务院农研中心主任的时候，所以能够制定出那么一些被人称颂的、有着重要作用的中央政策性的文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他真正地把握了中国的实际，真正地把握了农村最基层的人民群众内心的迫切要求。比如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说到底最简单、最形象的一个说法是，就是给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我记得我们 80 年代初下去调查的时候，木生同志（指张木生）也是经常下去调查，其实最开始农民的喜悦心情，其实他还很穷很穷，但是你问双包到户好在哪里，他就是一句话，就是自由了，自由了。实际上就是农民长期在人民公社这个体制下，经营自主权被剥夺，甚至生产生活中的许多自由也被剥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体现了农民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群众的呼声和愿望，但是它可以到北京，可以到西皇城根南街 9 号院里，变为党中央的文件，对全国的农村改革进行指导，我觉得杜老虽然是身居庙堂之高，对最基层的农民群众的迫切的内心需求，他是了解得非常清楚。我想这是我们做好任何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第二个，就是刘主任讲的，我也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到，杜老有一个海纳百川的、兼容并蓄的胸怀。在杜老领导下，我也有几次参加农村政策文件起草的机会，在这个楼里也好，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也好，刘主任带着我们起草文件，确实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坦率的说文件组里的有些人，参加文件讨论的有些人，你怎么也没有办法和他统一思想，而且按我当时 30 多岁那个年龄想起来，你请他来干什么呢，他老跟你唱反调，但是杜老就是这么一条，我就是需要有唱反调的人，如果一个文件组都是一个声音，那样要出麻烦，有人在你旁边唱反调，可以提醒你，让你考虑的更加周到，考虑的更加完善。所以我觉得那些文件之所以能起草的这么好，接受程度能够这么高，和杜老的胸怀有着重要的联系。第三个，也是刘主任刚才讲的，杜老真正体现了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这样一种境界，90 岁的高龄，思想仍然处在那么一个前沿，那么样一种活跃，这个确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有一个深感负疚的地方，我记得 1993 年，10 年之前，杜老 80 岁的时候，那时还在 9 号院。在 9 号院杜老办公室，有一次他跟我讲，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像样的秘书，我说你说什么样的秘书才是像样的。杜老跟我开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拿起美国或者英国刚出版的经济学的最新的原版著作，坐在对面可以用中国话念出来，让我听。就是英文的原版，坐在那念成中文给杜老听，这是杜老 80 岁时给我提的要求。估计这个人我不好找，找到了，我也开不起这份工钱。你想这样的水平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他对新知的这种渴求的心态，尽管他那时已经 80 岁了，实际上比我们当时 40 多岁的年轻人的学习愿望，显得更加迫切。所以我觉得可以总结的杜老的优秀的品德肯定是非常多非常多的。我自

己感觉到20多年的时间里，我在杜老的领导和教诲之下，这3个方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确实应该作为我做人和工作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再一次衷心祝杜老生日快乐，祝杜老健康长寿。谢谢。

林毅夫：今天我感到特别高兴，也特别荣幸，能够参加在杜老90岁生日的时候召开的一个座谈会。因为在杜老的晚辈学生当中，算起来我应该是最幸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的我是在台湾出生，1979年才回到大陆来，然后在北大读了3年的书，就到芝加哥大学去留学。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开始，杜老的名字当时也经常听到，但感觉他是一个非常远的，非常令我敬仰的一位长者，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机会会认识他，或是在他手下工作。在1985年的时候，我在芝加哥大学学完了一般课程，开始写博士论文，回到国内来收集资料。我在芝加哥大学只是一个博士生，在国内也不认识任何人，回到国内来收集资料非常的困难。当时国内的接待单位说，你要找农村的资料，怎么收集啊？我说我从报上看到了一个名字，就是杜润生（杜老），希望能有机会见见他，跟他请教一些问题。1985年的时候，我知道杜老当时主持很多工作，是非常忙的，在那种状况之下，杜老还特地接见了，交待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同志照顾我、安排我到农村，到安徽凤阳去收集资料，使我能够很顺利地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我1987年回国的时候，离开国内已经5年了，从我1979年回大陆到1987年回国，也不过就是8年的时间，在国内没有任何我认识的人，或是真正了解我的人。在那种状况之下，我找工作单位，很多单位表面上是欢迎我的，但是当我讲我要去那儿工作的时候，他们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的。可是杜老他张开双手，让我到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央决策单位，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发展研究所，去当副所长。因为杜老的这样一个胸怀，让我这么一个从海外回来的学子，能够很快地了解到、甚至在有些地方参与中央政策的讨论，观察中央的决策过程，让我有机会对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对所遭遇到的困难，有深刻的了解，对我个人作学术研究以及后来的理论发展，这是一个最宝贵的经验，是我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情。从1987年回国工作以后，在1987年到1993年，基本上是在杜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可以说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最充实的、最值得怀念的7年。1994年到北京大学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后，到现在转眼间前后有10年了。在这10年当中，我也是无时无刻地在杜老的精神感召之下，来研究中国的改革发展的、中国农村的问题。所以今天在杜老生日的讨论会上，我想再一次对杜老说，非常感谢杜老能够以一个长者的胸怀，以一个革命者对年轻晚辈关心的胸怀，接纳我这样一个从台湾回来的，从海外回来的学子，让我能够在大陆成长。

今天的讨论会，我的心情和刘主任、锡文的心情是一样的。首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荣幸，但是总觉得自己的能力、辈分是不够的。但是既然杜老他看得起我，叫我来谈谈农村改革先行的历史意义，那么我就就我自己所知道的，来谈谈我的一点认识。

要把中国的农村改革的历史意义了解清楚，我想必须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背景来

了解，因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中国现代化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讲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努力追求中国怎么样重新富强起来的一个过程。杜老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我们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后，一直在想怎么能够让中国恢复到历史上曾经达到的地位。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经过 150 年的时间，当中经过几次革命的努力，在 1949 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面宣布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记得有一次和杜老聊天，他说中国人怎样才能站起来，要是没有重工业，就没有国防产业，没有国防产业就要挨打。所以从 1953 年开始，中国开始实行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计划经济体制讲起来，应该说还是很有成效的。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中，在贫穷的农业基础之上，能够有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但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当时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的改善。到 1978 年开始农村改革的时候，我们还有 30%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怎么让一个国家富强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工业革命以后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因为从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上分成了发达的工业国家和落后的农业、被殖民的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被殖民的国家，他们取得了政治的独立，开始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包括印度、埃及、中南美洲国家，这些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以后，所推行的发展战略，虽然体制上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但推行的基本上也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这样一个战略。基本上从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这样一个战略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都没有赶上发达国家。所以从 70 年代末我们开始改革的时候，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使国家现代化以及完成国家的改革发展的问題。

中国是在 1978 年的年底开始的这一场农村改革，我们知道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用农民的话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它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的生产快速地发展。由于粮食生产，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使我们国家有信心在 1985 年把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改革推向城市以后，农民还继续为改革做贡献。首先在农村里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也是起了一个极大的推动作用。在 1978 年开始改革的时候，乡镇企业在工业的产值中只占 8%，但在 90 年代初的时候，乡镇企业在工业的产值当中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在出口当中所占比重也达到 40%。到了 90 年代，农民和农村还在继续为我们的改革做贡献，最主要的表现形势就是有将近 1 亿农民工进城，这 1 亿农民工到了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我们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可以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从 1978 年到 2002 年之间，这 24 年间平均起来，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速度达到 9.3%，我们的国民经济增加了 8.4 倍。在 1978 年底，开始改革的时候，小平同志提出一个目标是 20 年的时间，国民经济翻两番。我们回顾一下，20 年的时间，我们国民经济不仅是翻两番，而且是将近翻三番。这个成就跟农民的创造，跟农村改革的成功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苏联东欧也开始改革了，苏联东欧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方

式很不一样。他们从城市的工业改革做为着手点，推行的办法是所谓的休克疗法。现在 10 年的时间过去了，最近世界银行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对苏联东欧的改革的情形做了一个总结，跟中国从农村开始改革做对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在苏联东欧当中，成效最好的是波兰。波兰在 2000 年时国民生产总值跟在 1990 年相比增长了 44%，而我们这 20 年的改革是增长了 8 倍。而俄国在 2000 年的时候，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 1990 年对比的话，是下降了 36%。尤其是把中国 1990 年的整个国民经济的规模与苏联 1990 年的规模相对比，1990 年苏联是我们的 70%，但是到了 2000 年的时候，俄国只是我们的 24%。不仅是其它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不好，实际上从 80 年代初开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印度、非洲、中南美洲、南亚的国家，也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下，进行了改革，但是他们的改革绩效同样是非常不好的。最近有一个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迷失的 20 年。他研究了世界上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推动下在 80 年代进行的经济改革，相对比的这些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国家，他发现在 1960 年到 1980 年的 20 年间，也就是还没有改革的 20 年间，他们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2.5%，但是在进行改革后的 20 年，也就是 1980 年到 2000 年这 20 年的时间，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下进行的改革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平均的增长速度是 0，也就是基本没增长，比原来没有进行改革的时候还差。

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跟中国改革前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试图在经济非常落后的基础之上建立当时比较先进的重工业体系，在这样一个努力之下，他们共同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农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问题，一个是产业结构不协调的问题，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人民的生活得不到照顾的问题，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中国的改革，能够比较成功原因是，针对这样一个结构特性，如果是积极性低，我们先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如果把积极性提高了以后，那么一批新的物质创造出来，然后把这些新的创造出来的物质，配置到我们原来被抑制的轻工业的部门，那么产业结构能够调整。积极性提高了，产业结构调整了，经济发展就快了，那么物质就多了。物质多了以后，我们就有更多的条件来解决原来的国有企业，原来的经济体系里遗留的问题，也是靠这样的办法，来达到稳定和发展。在提高积极性方面，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所谓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剩下都是自己的”，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农民都变成了生产的主人。在这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之下，如果把 1978 年到 1984 年间和 1978 年以前 25 年的农业生产做对比，我们知道改革之前 25 年粮食生产平均每年只增产 2%，人口增长也是 2%，粮食拥有量没有增加，但是改革后这几年，在 1978 年到 1984 年，粮食每年增长 4.8%。农村牧、副、渔全部包括在内，改革前平均每年增长 2.4%，改革后平均每年增长 7.7%。所以出现了锡文同志所讲的在 80 年代初，农民是十分高兴的，而且全国人民也非常高兴，因为农产品的供给也增加了。农村改革，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创造了这么多的新增加的物质下，农民掌握了这些物质，在改革进入

到城市后，农民就把这些物质投入到新出现的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的投资基本上都是在轻工业部门，在我们市场需求很大的部门这方面投资，同样是改革我们的生产结构，让我们的经济更好地更活地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了我们的发展。这种改革方式，我觉得在理论上非常有意义，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现在还面临着改革和发展问题的国家，也是有意义的。怎么样先调动受抑制的积极性，把受抑制的积极性、生产能力释放出来，创造新的资源，然后把新资源配置到经济结构中，被抑制、被扭曲的生产部门，这样的话，就能取得发展，有了新的资源后，就能更好地解决遗留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能够从农村开始，而且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有些条件的。一个条件当然跟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老一辈的革命家像邓小平、万里等等他们的眼光有关。但同时我还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农民的首创精神，农民他是生活在最底层的，直接面向土地，直接面向自然，直接面向市场。只要将农民的首创精神释放出来，他自己就能创造出对他自己福利的提高有利的制度安排，这里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括乡镇企业。除了农民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是有一批像杜老和在座的农研室领导，那样了解国情、善于总结经验的干部，把农民的创造提升到理论，提升到政策的层次，制定与时俱进的政策，让农民的经验成为国内普遍的政策。

1978年改革到现在已经25年了，这25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25年，也可以讲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25年。展望未来，现在是21世纪了，在十六大的时候中央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国民经济翻两番，我想这个目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但这个目标的实现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农村，因为在80年代初农村改革取得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1984年开始到80年代后期，农村经济虽然还在继续发展，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农村问题也逐渐在积累，尤其是在90年代末，所谓“三农”问题、农民收入问题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怎样在农村问题上继续取得突破？我觉得在80年代农村改革的经验还是一个主要的指导精神，一个是保护农民的首创精神，农民都知道他自己需要什么。但也需要真正了解农村，能够不断总结农村经验，把农民创造的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的农业政策的研究官员。我自己现在在北京大学做理论工作，我会沿着这个精神，不断总结我们经济发展，农村发展的经验，对农村改革、发展以及对中国的现代化做点贡献。

我今天再次感谢杜老给我这个机会，非常高兴看到杜老身体这么健康，也希望10年以后，在杜老100岁的时候，我还能参加这样的研讨会，谢谢。

吴明瑜：前面几位讲的都是农业问题，我不是与大家来争，杜润生同志不仅是属于农民的，他也是知识界的，是科学界的，所以我要讲一点自己的看法。

1956年2月，我从经济部门调到科学院工作，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杜润生同志，到现在四十六年了。应该说我不仅只是晚辈，也是徒子徒孙的一员。今天我很高兴，看到杜老90高龄，身体依然健康，思维依然敏捷，特别是看到农村改革展示了新希望。刚才林毅夫同志讲90年代农村的改革，有一段我认为是停滞，某些方面是倒退，所以我听了大

家的发言很高兴。

我在杜老身边工作这么长的时间，朝夕相处多年，我有三点感受。第一点，杜老他不光是个才子，过去讲山西才子杜润生，他不光是个才子，不光是个好的领导工作者，他还是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家的特性表现在知行合一。他到任何一个部门去工作，他能把实际工作里面具体问题上升到政策、最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很多思想见解，再来指导实际工作。我们在科学技术部门工作，深深地感受到这一条。1956年2月，杜老是被贬到科学院来的，到科学院首先作的一项工作就是搞科学规划。当时700个科学家搞科学规划，700人，那么多科学门类，那么多建设的问题，这个规划怎么搞？全世界都没有经验，美国搞曼哈顿计划是搞一个原子弹，一个单项计划，我们如何搞综合、长远的战略性计划呢？700个科学家议论纷纷，意见很不一致，请了16位苏联专家来，也是各抒己见，怎么也弄不起来。杜老最后创造了一个我们当时非常佩服的一条，叫任务为经，学科为纬。把建设的重大问题作为经来排列，学科作为纬，把它交叉起来，这样把整个科学规划工作组织起来了。12年规划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奠定了中国科学现代化的一个基础。

从1956年到1961年，杜老领导科学院的一个政策研究班子，作了大量、深层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1960年冬到1961年4月，在他主持下，提出科学工作14条，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文件，是第一个系统总结科技战线三年“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时候，认为这个文件是科学工作的宪法。中央文件是这样写的：一切有知识分子的地方都要按照这个文件执行。不光是科学界，而是整个知识界。他不过在科学院工作刚刚4年多，就为整个科学工作的发展奠定了有理论指导的政策基础。

这个文件（十四条）概括起来，最主要的是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和实际的关系，这是多少年来科学界争论不休的，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那儿瞎争论。第二个是知识分子政策，也是红与专的问题。第三个是党的领导问题，就是外行和内行，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他把很复杂的科学工作高度概括，从这里面提出政策思想来，而且都是创新型的。

关于理论和实际问题，他研究了各国的科学发展的政策，研究自然科学取得成果的经验教训，力排众议。因为当时我们从来都是把科学和生产联系起来，科学、技术、生产联在一起，他经过1958到1960年，思想逐渐成熟，提出一个很完整的看法。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它的发展有它自己的特殊性，特别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发展，它的实际不仅仅是生产实际，当然很多方面最终要和生产实际相联系，但并不是所有的。他说应当尊重科学工作特有的方法，一个叫实验，一个叫计算（数学推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其他很多的科学理论都是这样子发展起来的，它是依靠实验的验证和数学的推导，不是简单地和生产结合。而且也不能要求所有的科学都为生产服务，当然大量的技术工作是和生产结合的，许多科学工作也是与生产有联系的，但是有一些是不和生产联系的。比如某些天文知识，宇宙的起源等等，你就无法和今天